

楚国历史文化与南方都市

刘礼堂 刘玉堂

本文将文献记载、考古发现、神话与历史传说相互参验,对楚国历史文化与
中国南方著名都市上海、南京、广州、武汉、长沙之间的关系作了系统考察。通过考
察,我们不难发现,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南方最主要的文化圈有楚文化圈、巴蜀文
化圈和百越文化圈。相比之下,楚文化是融合了华夏文化的精髓和蛮夷文化的津
液而形成的一种高势能文化,从而更具有变革、开创、兼容、适应的特质。因此,虽
然中国南方都市中的大多数在其早期曾隶属于百越文化圈,但高势能的楚文化则
随着楚疆的拓展和楚人的播迁而被这些都市所吸收;至于久处楚国腹心地带和由
楚人所始置的都市,其胚胎之中已饱孕着生生不已的楚文化因子。这也正是秦汉
以降中国南方都市能始终保持其经济与文化优势地位的重要因素之一。

楚人立国约 800 年,开疆方 5000 里。在春秋时期的南北角逐中,楚为南方各族之雄;在战
国时期的东西抗争中,楚居东方各国之长。据《淮南子·兵略训》记载,极盛时的楚国,“南卷沅
湘,北绕颍泗,西包巴蜀,东裹郢淮,颍汝以为洫,江汉以为池,垣之以邓林,绵之以方城。……大
地计众,中分天下。”随着楚国疆域的拓展和民族融合的加快,楚文化渐次渗透到中国南方地
区。而作为文化重要载体的中国南方都市,自然与楚国历史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研究楚国历
史文化与中国南方都市的关系,不仅能加深人们对楚民族强烈的开拓精神和楚文化旺盛的
生命活力的认识与理解,而且对于追溯中国南方都市的文化渊源及其形成与发展的历程,都具有
十分重要的意义。

上海 楚人对上海地区的开发和楚文化对上海地区的渗透,可从黄浦江的开掘历史中获
知。位于今上海市境内的黄浦江,又称黄歇浦、春申江,简称申江。凡此数称,皆因楚国令尹黄
歇号春申君而故名。故老相传,今上海市境内黄浦江为战国晚期楚国令尹春申君所开凿,宋代
以降的志乘也不乏类似记载。然而,因此说不见于唐代以前的历史地理文献,故长期以来对此
说持异议者甚众,绝大多数著作在介绍黄浦江的历史时甚至对楚令尹春申君开江事或只字不
提,或全盘否认^①,以致黄浦江的起源处于一片浑沌之中。

事实上,把今上海市境内的黄浦江说成是楚人春申君黄歇所倡导开掘,可能有附会之嫌。
但如果说今上海市境内黄浦江西南段最早系春申君所倡导开掘,却并非凿空之谈。

首先,从文献记载来看,今上海西南部地区战国晚期属于楚国令尹春申君的封地。据《史记
·春申君列传》记载,楚“考烈王元年,以黄歇为相(即令尹),封为春申君,赐淮北地十二县”,成
为楚国封君中封邑面积最大的一个。“后十五年”,春申君以“淮北地边齐”,应改郡为由,献出淮

北十二县,“请封于江东”,获考烈王允准。“春申君因城故吴墟,自以为都邑”。“江东”之地面积究竟有多大,史书没有明确记载,但至少不会小于淮北十二县。按《史记》张守节《正义》所言,春申君封邑在今苏州,而封邑一般是不会置于边陲的,也就是说,苏州大致上应处于“江东”之地的中心位置。顾名思义,“江东”之地的西界应即今长江东南岸的南京至芜湖一线,东界当即与今苏州毗连的上海西南部地区,因为苏州以东至东海地盘并不算大,不可能另属他国疆土。《战国策·楚策》谓:“楚国僻陋,托东海之上。”此处的“东海之上”,当即东海之滨,亦即今上海西南部。人们通常以为上海成陆于魏晋以后,实际上仅指今上海东部地区,并不能包括今上海西南部。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表明,在战国晚期,今上海西南部地区皆为楚地:在上海嘉定发现的楚国墓葬中,出土陶质郢爱和典型楚器^⑧;上海青浦县重固镇发掘的三座战国晚期墓葬,几乎每座墓中都至少出有四种陶器,即鼎、豆、壶、盒,另加罐、杯、钊、勺等,这恰好符合战国晚期楚墓的器物组合规律,且鼎、豆、壶、盒等器物的形制也同湖南常德、长沙同时期楚墓所出相同,故为楚墓无疑^⑨。这些墓葬的时间同春申君黄歇被封于“江东”的时间又完全吻合。因此,把它们视作春申君治“江东”留下的遗迹,不是没有理由的。

其次,楚人有着开凿人工运河的丰富经验和良好传统。楚人在长期征服水旱灾害的斗争实践中,创造和发展了农田水利工程,楚国统治集团为了军事斗争和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比较重视水利建设。据《史记·循吏列传》记载,楚庄王时,楚国大夫孙叔敖曾主持修建了期思雩娄灌区——期思陂。《国语·吴语》记楚灵王“阙石为郭,陂汉……”,即指楚灵王开凿了郢都至大型离宫章华台的人工河道,引来汉水注入其中,以擅舟楫和漕运之便利。战国晚期,楚人又在寿春南兴建了著名的芍陂。《水经注》卷二十八也说楚人曾在今湖北宜城开挖了人工运河——木渠。可以说,春秋战国时期,楚国开凿兴建的人工运河和其他水利工程的数量之多和质量之优,远非其他诸国所能比拟。这种兴修大型水利工程尤其是开凿人工运河的传统与经验,为春申君开凿黄浦江西南段奠定了基础。

再次,据文献记载,春申君在担任楚国令尹期间,曾在其封邑范围内开凿了多条人工运河。如《越绝书》称:“无锡河者,春申君治以为陂,凿语昭渚以东到大田,田名胥卑。凿胥卑下,以南注太湖,以泻西野”。又《七国考》卷二引《一统志》:“南直常州申浦江在江阴县西三十里。昔春申君开置田为上下屯,自大江南导,分为二:东入无锡,西入武进,戚野,俱达于运河。”此外,有关历史地理文献还记述春申君于今浙江吴兴开凿有黄浦。而上古时期江浙东部与今上海西南部地区自然环境并无大异,春申君既然能在北至江阴,南至吴兴修有大型水渠,也自然能在上海西南部地区兴建水利工程。

人们之所以否认黄浦江为春申君始凿,还有一个重要的理由,即楚人不可能开凿长达 114 公里的人工运河。其实,这个理由是难以成立的。《国语·吴语》记楚灵王开凿的今湖北潜江市至湖北江陵楚郢都继而通往汉江的人工运河,其长度就将近 100 公里。何况,在战国晚期,楚国已广泛使用了铁制生产工具。如此先进的生产工具,如此富有开拓精神的民族,如此高超的开凿河渠的技术,开凿黄浦江(西南段)并非难事。当然,楚人开凿的黄歇浦与今日的黄浦江并不能完全等同,后者无疑是在上海东部地区成陆之后,由后人在原黄歇浦的基础上由西南向东北逐步拓展的。诚然,岁月奄忽,我们不难想象今黄浦江西南段的宽度和长度与始掘时相同,同样不能排除今黄浦江西南段某些路段改变了原春申君开掘的故道的可能。

一般来说,大型水利工程都建于经济繁荣富强地区,而此类地区当建有城邑以便管理。虽然宋代始设上海镇,但上海地区最早建造的城邑当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因为楚人既然在上海西南部开掘有大型沟渠,必然在当地设有城邑。总之,透过黄浦江的早期开掘历史,人们不难洞见

楚文化在上海这个中国最大都市胚胎形成中的基因作用。

南京 中国七大古都之一的江南名城南京,有一个富丽堂皇的别称——金陵。据文献记载,战国晚期楚人在今南京市清凉山置金陵邑。唐人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在述及江南道润州上元县亦即今南京时说,“本金陵地,秦始皇时望气者云:‘五百年后,金陵有都邑之气。’故秦始皇东游以厌之,改其地曰秣陵,凿北山以绝其势。”“本金陵地”,王象之引作:“本金陵邑。”李吉甫同书在叙及石头城时又说:“石头城,在县(即上元县)西四里,即楚人之金陵城也。吴改为石头城,建安十六年,吴大帝修筑,以贮财宝军器……”,石头城为俗称,吴大帝孙权曾增筑故金陵邑,并改称建业。建兴元年(公元313年),因避愍帝司马邺讳,改建业为建康,故东晋王导说:“建康古之金陵”。另《立齐间录》亦云:“金陵即今南京,战国楚威王时,以其地有王气,埋金以镇之,故名。”李吉甫担任唐朝宰相时,稔悉历代图籍掌故及地理沿革,凡所记述必有所本。他说今南京市本楚金陵邑故地,应当是可信的。

今南京市及江苏省大部,春秋时属吴国领土,公元前473年越国灭亡吴国,遂纳入越国的版图。据《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记载:“楚威王兴兵而伐之,大败越,杀王无疆,尽取故吴地至浙江,北破齐于徐州”。也就是说,楚国又击溃了越国,原越国本土及其所并吴国疆土都成为楚国的疆域,今南京地区也就自然划进楚国的地盘了。对此,络绎不绝的考古发现提供了实物证明:在苏北清江市南郊高庆发现一座土坑木椁墓,木椁内分成四厢,完全是楚墓的葬制^①;在苏南高淳县固城湖东岸一里许,尚存固城城垣,该城址内外多次出土过楚国金币郢爱,城址附近的胥河北岸的楚王庙遗址中,出土有楚式陶器和郢爱^②;在武进县孟河发现一座土坑竖穴木椁墓,木椁四周以青灰色膏泥填充,出土的铜鼎、盒、壶、盘、匜的器物组合及形制,都表明是一座楚墓^③;在无锡县前洲高湊湾芦塘里发现鉴、豆、匜、洗、刀、剑等青铜器,其中一件鉴与两件豆上都刻有“郢陵君王子申……”的铭文。这些器皿可能出于同一墓葬,器物形制与铭文字体都是战国晚期的楚国作风^④。“郢陵君王子申”,文献无明载,有的学者认为可能是楚幽王熊悍之子,也可能是其弟^⑤;也有的学者认为很可能是王子负刍^⑥;还有的学者根据此三器铭文的字体和辞例,与寿县朱家集出土的楚考烈王熊完和楚幽王熊悍诸器接近,从而认为王子申有可能是战国晚期楚令尹春申君^⑦。无论王子申究竟为何人,他是楚国上层贵族则是可以肯定的。1975年,苏州市虎丘新塘发现一座土坑竖穴木椁墓,木椁四周是经过夯实的青灰泥,上面是“五花土”,这是典型的楚人墓葬形制,墓中还出土了典型的楚国器物铜盃^⑧。1980年,在今江苏吴县枫桥发现楚国墓葬,共出土青铜器33件,计有鼎、盃、盘、缶、匜、鉴、戈、矛、铍及车马饰等,其中铜盃肩部有铭文“楚叔之孙途为之盃”八字,经有关专家考订,遗物年代为楚威王六年或稍晚,即楚灭越时或稍后^⑨。1982年,江苏盱眙发现楚国铜壶和36枚郢爱^⑩。根据考古工作者所撰发掘简报和论著提供的确凿信息,1954年至1958年,在江苏省的高淳、句容、江宁、宝应、沛县、丹阳等县都发现了郢爱,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南京市公园路也发现了楚国金币郢爱^⑪。南京及其周围各县较普遍发现楚国墓葬和文物,说明包括南京在内的今江苏大部在楚灭越后全部并入楚境。由此说来,楚人在其统辖区域南京地区设置金陵邑以加强行政管理和军事防范,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完全可能的。

此外,从“金陵”之命名来看,也符合楚人命邑惯例。楚人命邑,对“陵”字尤有好感,以“陵”字的楚邑有:西陵、召陵、兰陵、长陵、养陵、造陵、平陵、竟陵、广陵、鄢陵等。而且,凡缀有“陵”字的城邑,必为经济、文化和军事重镇,这与金陵邑当时的地位恰好相符。这当不是偶然的巧合。

从楚金陵邑被后人直接用作南京的别称这一现象,不难想见楚文化在江淮地区流传之广和蕴蓄之深。

广州 五羊城,是广州市的别称。关于五羊城的得名,与两则传说有关。一说战国时期此地属楚,南海人高固任楚相,有五羊衔谷至其庭,以为祥瑞,固以为地名。另一说古时有五仙人,乘五色羊执六穗稻至此,此即五羊城之由来。前一说出自晋人方志,元陶宗仪《说郛》辑晋顾微《广州记》曰:“广州厅事梁上画五羊像,又作五谷囊随像悬之。云昔高固为楚相,五羊衔谷萃于楚庭,故图其像为瑞。六国时广州属楚”。清王漠《汉唐地理书钞》辑晋裴渊《广州记》说“南海高固为楚威王相时,有五羊衔谷之祥”。后一说源于唐人杂记志书,《说郛》辑唐郑熊《番禺杂记》:“广州昔有五仙骑五羊而至,遂名五羊”。宋《太平寰宇记》卷一百五十七:“按《续南越志》旧说:有五仙人乘五色羊持六穗稻而至,今称五羊城”。将两种说法予以比较,不难看出后者源于前者,只不过后者隐去了南海人高固为楚威王相”的史实,将“五羊衔谷”变成“五仙人乘五色羊持六穗”。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即晋人的志书中的“五羊”仍然是唐以后传说的“核心”。也就是说,无论是何种说法,都认为“羊”与广州的起源有着极其神秘的联系。因此,只要我们破译了“五羊”这个密码,就等于揭示了五羊传说的文化底蕴。

英国著名生物学家赫胥黎指出:“古代的传说如用现代严密的科学方法检验,大都象梦一样平凡地消失了。但奇怪的是这种梦一样的传说往往是个半睡半醒的梦,预示着历史的真实”。“五羊”传说这个半睡半醒的梦,揭示楚文化对以广州为轴心的南越渗透的历史的真实。

如果有人说羊是楚人先民的姓,或许被斥为梦呓,然而,这却是明明白白的历史。《国语·郑语》谓𪚩为楚人先祖祝融八姓之一。对此,《史记·楚世家》记述尤详:“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吴回生陆终,陆终生子六人,……六曰季连,𪚩姓,楚其后也。”司马贞《索隐》引《世本》也同。又《史记·秦本纪》谓秦昭王之母为楚人,“姓𪚩氏”;《左传·定公四年》记吴师入郢后楚昭王携其妹季芊奔都避难;《吴越春秋·阖闾内传》谓楚昭王“与妹季芊出河雒之间”。如此看来,无论是中原诸夏,还是南方吴越,都一致认为楚人姓𪚩。楚人为何姓𪚩,古代有关著作均认为与羊有关。《史记·楚世家》司马贞《索隐》云:“𪚩,音弥是反。𪚩,羊声也。”许慎《说文》也说:“𪚩,羊鸣也,气上出,与牟同义。”“𪚩”,金文作𪚩,从女,正是上古母系社会的姓,而季连之姓,恰是随其母族之姓。因为季连之母女嫫本是羌人。《世本》记楚人的嫡系祖先季连之父陆终“聚鬼方氏妹,曰女嫫”,鬼方属羌人系统,而羌人以羊为图腾。《说文》:“羌,西域牧羊人也,从人,从羊,羊亦声。”《风俗通义》:“羌,本西戎卑贱者也,主牧羊,故羌字从羊,因此为号。”正因为楚人嫡祖姓𪚩,所以,在异族人眼中,𪚩即羊,就是楚民族的代称。由南方越人创作进而由晋代文人加工的“五羊衔谷至于楚庭”的传说,就是楚人向南越拓疆和楚文化南播的历史印记。谓羊有“五”,是因为魏晋时期五行观念盛行;而“衔谷”或“持穗”,则是越人对楚文化南渐的颂辞,因为谷穗在古代人心目中是祥瑞丰穰的象征。

对晋人顾微《广州记》云:“六国时广州属楚”这句话,至今仍有不少人不以为然。其实,自战国中期广州地区就处于楚人的控制之下。《战国策·楚策》记:“吴起为楚悼王罢无能,废无用,……南攻扬越,北并陈蔡。”《史记》所载基本相同,只是有时作“南平百越”,有时又作“南攻扬越”。《后汉书·南蛮列传》在记叙此事时将扬越写作“蛮越”,并指出其部分地域概念:“吴起相悼王,南并蛮越,遂有洞庭、苍梧。”战国时期的“苍梧”,即包括今湘南粤北的九嶷山至五岭以南地区。及至战国晚期楚威王灭越,广州地区已纳入楚国疆土。因此晋人谓越人高固为楚威王相,是很有可能,这与《左传·襄公十三年》所记楚人“抚有蛮夷,以属诸夏”的民族政策是吻合的。《史记·货殖列传》也将广州列于“南楚”范围之内,并说:“九疑、苍梧以南至儋耳者,与江南大同俗,而扬越多焉。番禺亦其一都会也,珠玑、犀、瑇瑁、布之凑”。在这里司马迁显然是将番禺视为“南楚”都会的。考古发现也证实了广州战国时期已属楚地。1962年,广东始兴石砰发现

楚国凹字形铁锄和长方形铁斧^⑧；1972年，广东德庆落雁山出土楚式剑^⑨，1973年，广东四会乌旦山出土楚式铜剑^⑩。广东肇庆松山出土的铜罍，花纹由相勾连的飞鸟和云气组成，生动流畅，是楚国典型的作品^⑪。此外，广东广宁铜鼓岗^⑫、罗定南门洞^⑬等地出土的青铜器，不少是江淮流域楚墓中的常见之物^⑭，当是楚文化润泽广州留下的痕迹。

武汉 自春秋中期至战国中期，今武汉地区一直处于楚国的腹心地带。楚人最早控制武汉地区，是西周晚期。《史记·楚世家》记：“周夷王之时，王室微，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扬粤，至于郢。”熊渠所伐之“郢”，在今湖北鄂州市境，是扬越的经济中心，以盛产红铜著称。在郢的南面不远的地方，即今大冶铜绿山一带，有一个先秦时期我国或许是最大的红铜生产基地。在那个时代，红铜是第一类的战略物资。熊渠正是在红铜的诱惑之下，才不惮长江风浪之险，远征扬越鄂地的。鄂位于武汉市东南约50公里，而当时楚人的都城位于今湖北南漳县境内，楚人征伐郢，行军路线不论是沿汉水而南下转入长江，还是过随枣走廊经今安陆、云梦东行，武汉都是必经之地。根据当时的情况，楚人也不可能舍此二路而别择他径。楚伐郢当是武汉地区直接受楚文化浸润之始。熊渠占据郢后，遂将其子皆封于江上楚蛮之地。所谓“江上楚蛮之地”，不管是从地域概念，或是从民族概念来讲，都包括沿江的今武汉地区。不过，由于楚国当时国力有限，加之周王朝的干预，楚人并未能就此控制并占领包括武汉地区在内的长江中游沿岸^⑮。据《史记·楚世家》记载，不久熊渠被迫撤销了其子的封号，封地也自然失去控制权。尽管熊渠时楚人只是短暂控制过武汉地区，但毕竟为后来楚人占领该地奠定了基础。

楚人真正占领武汉地区，是春秋中期，说得更确切一些，是在楚成王时。楚成王奋武、文二世威服汉阳诸姬之余烈，北收弦、黄，控制了大别山南北的交通要塞^⑯，今武汉就成为楚国的正式版图了。《史记·楚世家》记楚成王“使人献天子，天子赐胙，曰：‘镇尔南方夷越之乱，无侵中国。’”于是楚地千里。”“楚地千里”，无论以何种方式计算都不至于将武汉地区排除在外。1977年至1978年，考古工作者在武汉市黄陂鲁台山发掘了西周墓5座，东周墓30座。5座西周墓，据有关同志研究，其文化内涵是商周文化的融合，表明了西周时代楚人至少尚未正式占领这个地方^⑰。鲁台山的30座东周墓，年代为春秋中期至战国晚期，据有关同志研究，虽则中原和关中风格及本地特色犹存，但楚式特色已占主导地位，而且愈到后期愈是明显^⑱。由此可见，从春秋中期起，楚文化对武汉地区的影响就逐渐深入了。可以这么说，黄陂鲁台山东周墓的发现，为我们探讨楚文化影响武汉地区的时间提供了确切的信息。进入战国时期，楚文化对武汉地区的影响更趋深入了。在武汉市汉口东北部谌家矶发现了战国楚墓，出现了铜剑、铜簇、陶器皿等典型楚国文物^⑲。此外，在武汉北部的孝感，西北部的云梦、安陆，西部的汉川，南部的黄冈和鄂州等地，都发现过战国时期的楚墓葬^⑳。

从对有关文献记载和地质勘探材料的综合分析来看，武汉地区在春秋战国时期虽然是沼泽密布、芦苇丛生，却仍有不少供人们栖息的沙洲土墩和高地。楚人为了控制大别山南北通道，扼住长江与汉水两大水上交通咽喉，是不可能不在此地建立军事据点的^㉑。早在商代的殷人或其方国尚且知道在武汉兴建城池——“盘龙城”，春秋战国时期的楚人岂能例外？

长沙 长沙，是战国时期楚国的经济重镇和军事要邑。楚国自迁都于今湖北江陵纪南城之郢后，便大力开拓和经营南方。而位于湘水中游的长沙，便理所当然地成为楚“南平百越”的经济重镇和军事要邑。

之所以说长沙曾是楚国的经济重镇，首先是因为长沙是楚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记载：“夏畦、庞、长沙，楚之粟也；竟陵泽，楚之材也。越窥兵通无假之关，此四

邑者不上贡于郢矣。”长沙等地不上贡事于国家，主要是郢都距长沙较远，运费耗用大，不如将长沙的粮食就地屯积，如此一则可免运输之靡，二则可供楚人用兵南方的给养。

长沙不仅盛产粮食，而且还有丰富的矿产。《史记·货殖列传》称：“江南出……金、锡、连、丹沙。”又说：“……长沙出连锡。”裴骃《集解》引徐广曰：“连，音莲，铅之未铸者。”铅是铸造青铜器的重要原料。长沙地区丰饶的铅矿产，无疑为楚国经济注入了新鲜血液。

长沙还是楚国重要的手工业生产基地和与南方经济交流的驿站。《史记·南越列传》称：“高后时，有司请禁南越关市铁器。（赵）佗曰：‘高帝立我，通使物。今高后听谗臣，别异蛮夷，隔绝器物，此必长沙王计也’。”可见，铁器由长沙供应南越，乃是汉初以前就已形成的历史传统，其源无疑上溯到楚人^⑧。据不完全统计，迄今在长沙地区发现楚国铁器 240 多件，其中，生产工具占 120 余件，这个比例大体上反映出当时楚国铁器的实际情况。由于楚人的铁器从长沙源源进入西南地区，并从那里大量运出各种土特产，这就大大加强了彼此间的贸易关系，从而也就对开发大西南乃至同域外交流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虽说春秋中期楚文化已对长沙地区产生影响，如湘乡出土的铜缶，便是楚国特有的器类之一。但是，楚人真正进入长沙一带则是春秋晚期。在长沙、湘潭等地都发掘出不少随葬陶鬲、盆、罐的楚墓。一般来讲，这种组合的墓葬应早于随葬仿铜陶礼器的墓葬，其上限可到春秋末叶。战国时期，随着楚人对江南的开发，楚文化在长沙地区得到了长足发展。湖南已发掘战国时期的楚墓 3000 余座，绝大部分出于长沙地区。1971 年发现的浏城桥 1 号墓，随葬成套的仿铜陶礼器，当为楚国大夫一级的贵族墓葬，其时代为战国初年。湘乡牛形山曾发现两座规模较大的战国中期楚墓，虽屡经盗掘，仍出土了大量精美文物，当为上层贵族墓葬^⑨。上层贵族墓葬在长沙发现，足以说明长沙在楚国历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纵观楚国历史，春秋时期楚人虽屡屡对今洞庭湖以南用兵，但并未真正占领此地。战国初年越灭吴后，为了对抗越人，楚人才开始占领长沙地区。因此，在今益阳、德山、湘乡、衡阳、资兴等地相继发现了战国时期楚人的军事驻地。楚灭越后，这里成为抗秦的稳定后方，经济文化得到迅速发展，代表着晚期楚文化发展水平。自战国以降楚文化在长沙地区的统治地位，一直持续到西汉初年。

上文只是对春秋战国这一特定历史时期楚国历史文化与中国南方都市之间的关系作了考察。通过考察，我们不难发现，楚国历史文化与中国南方都市之间的关系大致存在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都市由楚人始置，其早期名称源于楚人、楚事、楚物，今名出现后，原名称一直作为别称保留，此类都市有上海、南京和广州。第二种类型是都市于其所在地成为楚国经济文化重心后由楚人设置并命名，其名称沿用至今未改，此类都市有长沙。第三种类型是都市久处楚国腹地地带，其早期城邑出现的确切时间虽史无明载，但揆诸事理，当由楚人于春秋中晚期所置，此类都市有武汉。不过，尽管这些都市同楚国历史文化的关系有不同程度的区别和差异，但是，它们却有着惊人的相似：即不仅在形成、初生时期已深深地打上了楚文化的烙印，而且在后世中国文化尤其是南方文化的发展与传播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从秦到清，中国文化重心曾三次南移：第一次南移在两晋之际，第二次南移在两宋之交，第三次南移在晚清之时。在这三次规模巨大且意义深远的文化重心南移中，南方都市担负了极为重要的历史使命。透过中国历史文化的演进轨迹，人们惊奇的发现，秦汉以降的中国南方都市不只派演出巫观文化、道教文化、南方佛教文化和江南土民族文化，还包孕了近代湖湘文化、海派文化、岭南文化和闽台文化。尤其不可忽略的是，南方都市在商品经济发展与资本主义萌芽、近代戊戌维新、辛亥革命、现代新民

主义革命乃至当代社会主义经济文化建设等重大历史变革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然而,这种作用的文化渊薮,则不能不追溯到楚国历史文化对中国南方都市的浸染、渗透与泽被;同样,也不能不追溯到上古中国南方都市对楚文化以及其他诸文化的集结、化合与辐射。

注 释:

- ① 解放前后,尤其是近年来出版的辞书、历史和地理教科书及图册、方志、旅游书籍以及有关探讨上海市早期历史的论著,在涉及黄浦江时,大都否认其系春申君所始凿。
- ② 黄宜佩:《上海市嘉定县外冈古墓清理》,《考古》1959年第12期。
- ③ 上海市博物馆:《上海青浦县重固战国墓》,《考古》1988年第8期。
- ④ 《清江市高庆东周大墓纪要》,江苏《文博通讯》总第21期。
- ⑤ 刘建国:《吴国中部古城考》,《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1980年年会论文选》。
- ⑥ 《武进孟河战国墓》,《考古》1984年第2期。
- ⑦ 李零、刘雨:《楚郢陵君三器》,《文物》1980年第8期。
- ⑧ 李学勤:《从新出青铜器看长江下游文化的发展》,《文物》1980年第8期。
- ⑨ 何浩:《陵君与春申君》,《江汉考古》1985年第2期。
- ⑩ 董楚平:《楚败越过程考略》,载《百越史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200页。
- ⑪ 《苏州虎丘东周墓》,《文物》1981年第11期。
- ⑫ 张志新:《吴县何山楚墓出土文物及其意义》,《江苏文博通讯》总第33期。
- ⑬ 南京博物院:《江苏盱眙南窑庄楚汉文物窖藏》,载《文物》1982年第11期。
- ⑭ 张浦生:《江苏“郢爱”》,《文物》1959年第4期。
- ⑮ 莫稚:《广东始兴白石坪山战国遗址》,《考古》1963年第4期。
- ⑯ 徐恒彬等:《广东德庆发现战国墓》,《文物》1973年第9期。
- ⑰ 广东省博物馆:《广东四会乌旦山战国墓》,《考古》1975年第2期。
- ⑱ 广东省博物馆等:《广东肇庆松山古墓发掘简报》,《文物》1974年第11期。
- ⑲ 见《南方日报》1977年11月23日第2版报道
- ⑳ 见《南方日报》1977年12月25日第2版报道
- ㉑ 《中国考古学会第二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第72页。
- ㉒ 刘玉堂:《论湖北境内古越族的若干问题》,《民族研究》1987年第2期。
- ㉓ 张正明、刘玉堂:《大冶铜绿山古铜矿的国属——兼论上古产铜中心的变迁》,《楚史论丛·初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6页。
- ㉔ 陈贤一:《黄陂鲁台山西周墓文化剖析》,《江汉考古》1982年第2期。
- ㉕ 涂高潮:《略谈鲁台山东周墓》,《江汉考古》1982年第2期。
- ㉖ 郭冰廉:《汉口东北郊湛家矶发现战国铜兵器》,《文物》1959年第5期。
- ㉗ 楚文化研究会编:《楚文化考古大事记》,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48、113、140页。
- ㉘ 袁纯富、刘玉堂:《武汉古地理的变迁及其对经济的影响》,载《古代长江中游的经济开发》,武汉出版社1988年版,第7页。
- ㉙ 郭仁成:《楚国商业初探》,《江汉论坛》1984年第5期。
- ㉚ 黄纲正:《楚文化在湖南的发展历程》,载《楚文化研究论集》第1集,荆楚书社1987年版,第92页。

(本文责任编辑 吴友法)